



企业剩余索取权： 分享安排与 剩余计量



谢德仁 著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主编 陈昕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7462

企业剩余索取权： 分享安排与 剩余计量

谢德仁 著

当代经济学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与剩余计量/谢德仁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当代经济学文库)

ISBN 7-208-03703-5

I .企... II .谢... III .企业管理 - 会计

IV .F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4499 号

责任编辑 张启
装帧设计 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敬人 + 徐立新

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与剩余计量 谢德仁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上海绍兴路 5 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公司排版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13.5 插页:6 字数:28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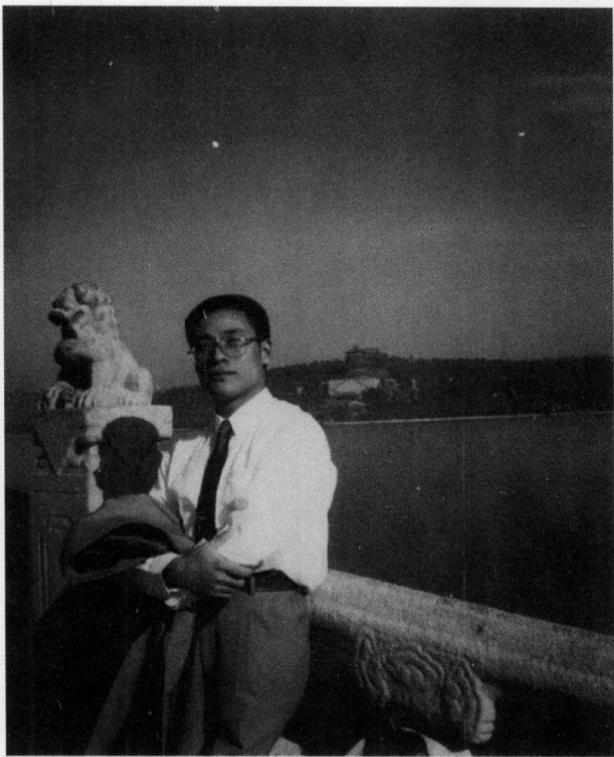
印数:1—5,100

ISBN 7-208-03703-5/F·749

定价:25.00 元

本书初稿 2001 年被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评选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作者近照



作 者 简 介

谢德仁，1972 年出生于安徽省祁门县。1989 年考入厦门大学会计系，1993 年获学士学位，被保送本系攻读硕士学位，1995 年提前攻博，1998 年获博士学位，毕业论文被评为福建省及厦门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1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1998 年荣获“第三届厦门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999 年 7 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现还兼任中国会计学会《会计研究》杂志特约编辑等职。已在《经济研究》、《会计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0 多篇，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全文转载。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纵向与横向研究课题多项。

出版前言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四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4)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该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高、新、尖”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 20 世纪 90 年代的通用教材;“新知文丛”则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国际上当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而共同努力。

(4) 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着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尽在不言中(代前言)

漫半生半，生半死处。聚尚叶散云，全一不

文学硕士真善美”，恒服

从一则禅师故事说起

“尽在不言中”是我读过的一则日本的禅师故事。这则故事让我为之会心一笑，且让我如醍醐灌顶般地悟了关于“隔”的问题，我想这大概就是东方的智慧吧。先让我们一起读一遍“尽在不言中”，然后再讲我自己的故事。

日本古时候有个习俗：云游和尚若能以讲经论道胜了住持和尚，就可以留宿该寺；反之，则只好继续上路。

故事发生在日本北方的一个寺院里。院中住着兄弟俩：兄长学富五车，外表也飘洒俊逸；胞弟却蠢笨之极，学识浅陋，而且形象丑恶，还瞎了一只眼睛。

有一天，来了一个云游和尚请求借宿，依例邀请寺主讲经论道以定去留。兄长当天精疲力尽，让弟弟代行其事。

于是，弟弟与云游和尚择一静室，相对而坐。

不一会，云游和尚就找到寺主，毕恭毕敬地说：“令弟真乃饱学之士，胜我易如反掌。”

“愿闻其详。”寺主说。

“嗯，是这样的，”云游和尚说，“开始，我举起一个手指，代表上帝。他举起两个手指，表示上帝及其训诫。我又举起三个手指，代表上帝及其训诫和他的门徒。他对我摇晃拳头，暗示此三者本为一体。这样，他就大获全胜了，我已无权留宿贵寺。”说完，云游和尚走了。

“那家伙哪儿去啦？”弟弟跑了过来，询问兄长。

“我听说你已经赢了他。他已经走了。”

“赢？ 赢什么？ 我只想狠狠地揍他一顿。”

“跟我说说辩论的情景。”兄长说。

“哼，他一看见我就伸出一个手指，侮辱我是独眼龙。因为他是客，我觉得不妨谦让些，于是我举起了两个手指，恭贺他双眼俱全。谁知那野和尚竟举起了三个手指，意思

是我们两人加起来才三只眼睛。这次我可忍无可忍了，正要挥拳而上，他却跑了。就这么不了了之啦。”（摘自《青年参考》1997年5月2日第5版）

故事中的云游和尚和弟弟面对着同样内容的信息却产生了全然不同的涵义解读。另一个颇为经典的例子是，中国主人和西方主人面对客人发出的“不要茶，不必客气”这一同样的信息时，会作出全然不同的涵义解读与反应（决策）：中国主人依然会为其客人端上一杯茶，而西方主人则不会端茶了。中国客人会认为西方主人没有教养，而西方客人则会认为中国主人不尊重其意愿。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他们既有的作为解读新获信息的解释框架的知识结构之不同，这就是“隔”。正如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有代沟相“隔”一样，“隔”就代表着一种深层次的不可或难以通约性。“隔”其实就是一种知识与信息的不对称。人们在决策时面对两种必备的决策结构，即其既有的知识结构与新获的信

息结构。^①人们的决策其实就是以既有的知识结构作为解释框架去解读新获的信息结构的所谓真实涵义，然后决策并采取行动。由于知识结构与信息结构的“隔”，自然会发生种种误解与误读了。“言的”是信息，“不言的”是既有的知识结构，欲知所言何物，必须置“言”于“不言”之中方可^②，即需要“正”解与“正”读的内容都“尽在不言中”。客叔西人

汪丁丁博士把困扰他的西方经济学传统（逻辑）与中国本土“故事”之“隔”描述为一个阐释学悖论，那就是“讲故事的逻辑”^③：语言是西方传统的，而“故事”则是中国本土的，怎么把中国的故事融入西方传统呢？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分期的问题。“封建主义”在西方是指以庄园制为主的经济时期，在中国与庄园制相对应的经济制度，是古代的井田制，这一制度早已于春秋战国时期就土崩瓦解了。在秦、汉之后，中国就是一个契约性的商业社会了，但我们将之统统纳入“封建主义”这个用以划分西方历史的

概念之中,从而曲解、误读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史。^④如果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我们已经把“苏联范式”的逻辑成功地转换成了中国本土的逻辑,消除了苏联式计划经济逻辑与中国本土故事之“隔”,从而可以顺畅地讲中国本土“故事”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得不面临着新的逻辑困境,那就是如何用市场经济的逻辑来演绎中国本土的“故事”。新的逻辑转换迄今仍未完成,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如何消除这一新的“隔”,我们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如何成功地把“他山之石”搬过来,还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试错”(trial and error)努力。消除这一新“隔”之日,也就是中国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学说之时。

1993年的夏季,我很幸运地得到了继续在名师荟萃的厦门大学会计系进行深造的机会,并于1995年幸运地被吴水澎教授收列于门墙。我在学习会计学知识的同时,也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和企业

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在学习过程中也进行了一些较深入的思考,并尝试着将一些思想“火花”撰写成文向学界前辈和同仁讨教。作为一个同时学习会计学和西方经济学的青年学子来说,我更偏好将这两个领域的知识融合起来,做一些交叉性的研究工作。在这一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也深深地为各种“隔”所困扰,其中不仅包括西方经济学传统与中国本土经济故事之“隔”,还包括西方会计传统与中国本土的会计故事之“隔”以及经济学传统与会计学传统之“隔”,等等。要成功地消除这些“隔”,就必须对“隔”的两边都有透彻的理解,即所谓“学贯中西”、“学贯经会”。我离这一要求还距离很远很远,我也误读过许多西方经济学与西方会计学,闹过许多“隔”的笑话。我所唯一确知和保证的是,我在努力,在一点一滴地消除这些“隔”。我也希望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著作能够少一些因“隔”而产生的错误,能够对促进经济学与会计学的知识增长有所贡献。

写作动机与背景

本书是我在 1998 年完成并顺利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在此我将写作动机与背景向读者作一简要说明。

本书是以对现代企业理论中的企业剩余索取权的研究为中心而展开的。在讨论了一些基本假设与基本概念之后，本书主要讨论企业剩余索取权的界定、特征与企业所有权的安排，及企业剩余索取权在企业所有权安排框架中的分享安排原则。在分析剩余索取权的分享安排时，本书提出了一个关于企业性质新的理解，即企业是市场中一组不完备的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的履行过程。接着研讨企业剩余的计量问题，本书提出了一个企业剩余计量的悖论，然后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来解读之。本书是以交易成本为分析工具研究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并提出了“会计准则的性质是一份公共合约”的新观点和一个包容会计理论在内的新的广义企业理论框

架来解读。然后本书重点以上述理论研究为指导,讨论中国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安排的有关问题和 1840—2000 年中国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变迁史及进一步变迁的问题,力求以事实为准绳,以数据来说话,讲好中国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安排和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变迁的本土“故事”。本书对中国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安排,以及中国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变迁进行认真的实证分析,并试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以上就是本书的研究主题。这一研究主题主要是进行经济学与会计学的交叉研究,其内容涉及企业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与会计学等几个领域。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企业剩余计量悖论是我自己发现并于 1996 年 10 月提出来的(谢德仁, 1996c)。读者在正文中会发现,我之所以能提出这一悖论,得益于我的经济学与会计学双重知识结构。但要解读这一悖论却非易事,尤其是乏于资料。而应用这些理论来研究中国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安排

问题时,却是文献资料太多,且国有企业改革千头万绪,难以梳理。对中国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变迁的研究也有类似难题。

但这一研究主题的价值与难度深深地吸引我选之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已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中国经济学界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业已展开了深入而丰富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其中包括对西方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的引进、消化与应用。企业剩余索取权是企业所有权的主要方面之一,它与企业剩余控制权共同构成了企业所有权,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外经济学界关于企业理论研究经久不衰的一个热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现在已深入到企业所有权改革这一层面,这是中国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与热点,自然也是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的前沿课题。此外,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关注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会计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会计信息失真亦同